



光明日报丛书



视野内的历程

苏双碧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视野内的历程

苏双碧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视野内的历程

苏双碧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本 8.375印张 184千字

1990年6月 第1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1—1150册 定价：5.00元

ISBN7-80014-708-8/D·77

前 言

从1974年7月到1988年7月，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整整十四个年头。这十四年是祖国风云变幻的年代，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年代，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和光明日报这张报纸的曲折历程一样，作为一名编辑，我的思想和工作，也必然在这张报纸上有所记录，有所表现。十年动乱的最后两年，我是在光明日报度过的。这两年，我到过干校劳动，也和同志们一样，违心地做了一些诸如评法批儒文章的编辑工作。但由于我在“文革”初期，曾因和“三家村”的关系被株连，把我在“文革”前写的学术文章都当成“封资修”的货色加以批判，所以既心有余悸，也有抵触情绪，虽然身在报社，却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四人帮”垮台之后，我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为本报撰写文章，也搞了一些学术研究。十年当中，出版过几本书，发表过几十篇文章。但大多是属于历史理论和近代史方面的学术文章。而这期间，我先后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三十多篇文章，却大多是有点时代气息的，多少反映了时代的声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论界对某些问题的探讨情况。其中如《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等等，当时在国内外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我在出版《朝夕集》、《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等书时，曾想把这些文章收入其中，作为对历史的记忆留在我的集子之中，但都因为不好归类，考虑再三又抽了下来。这件事，总有点感到不遂心愿，因而总希望有个机会把这些文章收在一起出版。

最近，光明日报出版社决定出版《光明日报编辑记者丛书》，

为实现我的愿望提供了条件。丛书编委会决定为我出一本集子，我对光明日报表示出自内心的感谢。在光明日报十多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对光明日报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本集子多少可以反映我在光明日报期间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也可以给我个人以及光明日报留下一点纪念。

集子按规定选了二十万字，共29篇文章。其中16篇发表在本报，这17篇中唯有一篇是发表在1964年的，其余15篇都是发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还有13篇也大多和光明日报有点关系，例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在香港大学《人的革命》国际理论讨论会上的报告稿；《李贽思想新探》是出席泉州纪念李贽诞生400周年提供的论文；《试论初唐经济发展的原因》一文是根据在厦门大学、福建师大的报告稿整理成文的；《林则徐禁烟代表历史的进步趋向》是出席福州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会的论文；《编辑工作与百家争鸣》是在内蒙古新闻讲习班的讲课稿；《编辑工作断想》是应全国新闻职称办公室之约而写的。这些文章都是以光明日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的活动写出来的。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选编这个集子时，本来还可选进一些学术性、理论性较强的文章，但为了适合报纸的特点，增加集子的可读性，特地选进纪念吴晗、邓拓以及庆祝罗尔纲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的三篇文章，还有《惠女水库》等三篇散文、一篇书评。这样一来内容可能杂些，但作为报社的丛书，内容可能更合适些，也可能更有时代的标记。

这个集子取名为《视野内的历程》，意思是收入集子里的文章基本反映了我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思想工作活动范围及其历程。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待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思路，它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又只能是在我的视野之内。因此，它所反映的只是时代的一个侧面，于读者了解这个时代或者多少会起参考作用。

在汇集这个集子时，我因工作需要已离开光明日报，但我始

终不会忘记在光明日报十多年的工作历程，始终不会忘记光明日报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始终不会忘记和我一起工作、生活过的朋友和同志。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作为光明日报的一个读者，定会和光明日报保持永久的联系。最后，请允许我再一次向光明日报出版社和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苏双碧

1988年9月于北京沙滩

目 录

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
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	(10)
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	
——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25)
试论海瑞精神	(33)
百家争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39)
一年来史学理论的探讨	(50)
加强对宏观史学的评论	(58)
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兼谈理论现代化问题	(65)
解放思想 勇于探索	
——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十周年	(74)
关于开展“百家争鸣”中的几个问题	(85)
关于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	(95)
再谈百家争鸣的指导思想	(101)
试论唐初经济发展的原因	(108)
李贽思想新探	(120)
林则徐禁烟代表历史的进步趋向	
——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	(138)
略论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和琦善	(146)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问题	(152)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从康有为的《大同书》说起	(160)

康有为和公车上书·····	(167)
编辑工作和百家争鸣·····	(174)
编辑工作断想·····	(191)
学术领域的可喜成果	
——读胡绳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204)
从铭刻在心的印象说起	
——关于《吴晗传》·····	(209)
学术界的朋友和战士	
——为纪念邓拓逝世二十周年而写·····	(216)
渊博笃诚 和蔼可亲	
——为祝贺罗老学术研究六十周年而写····	(226)
惠女水库·····	(240)
炎夏时节访榴园·····	(241)
悠悠故园情·····	(243)
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	(247)

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下称《评新编》)是姚文元在1965年11月10日抛出来的。江青供认这篇文章是她“组织”的,在张春桥的参与下由姚文元炮制的。“四人帮”中的三人便以策划这篇文章为纽带,开始纠合起来了。江青说她“组织”这篇文章时是搞了“保密”的,是“暗中藏着”的。还说张春桥、姚文元“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姚文元也说:“那我就豁出去了。”显然,如果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要这样鬼鬼祟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风险”,而且必须“豁出去”才敢去干呢?可见他们是心怀叵测的。江青在得意之余,曾把《评新编》说成是他们进行篡党夺权的“信号”。而对姚文元来说,《评新编》则是他飞黄腾达的“奠基石”。现在“四人帮”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姚文元的其他黑文早已批判,他的这块“奠基石”难道不该推倒吗?现在是把《评新编》拿出来示众的时候了。

《评新编》问题很多,有的问题还很大,本文不可能都涉及,只就如下几个问题进行批判。

实行法西斯思想独裁的反动“信号”

姚文元的《评新编》公开打的旗号是批判《海瑞罢官》。但是,这

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实际上，“四人帮”是经过精心策划才选择了“清官”海瑞作为他们挾伐的对象的。他们阴谋通过批判海瑞的“勇敢”精神，既可以达到对人民群众禁锢思想、堵塞言路的目的，又可以把一大批敢于谈海瑞“勇敢”精神的人打下去，杀鸡儆猴，一箭双雕。

历史人物海瑞，敢于向嘉靖皇帝进谏，敢于说真话，敢于挑剔当时朝廷的弊政，确实是有点“勇敢”精神的，因而被称之为“刚直不阿”，后代人把他奉为“清官”，加以传颂。“四人帮”要控制舆论，就必须禁锢人民的思想，以便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把有点勇敢精神的人打下去，就成了他们的既定方针。拿海瑞开刀，大兴文字狱，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很合适的。

姚文元在《评新编》中，明确地叫嚷“刚直不阿”是“地主阶级提倡的”，并说凡是反对“乡愿”和“甘草”的，都是“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瞧！姚文元说得多清楚，他是要让党的干部都成为“甘草”和“乡愿”的，并胡说那些具有“乡愿”和“甘草”特点的干部，是“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的，而具有勇敢精神的人，却成了敢于“坚持错误”，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评新编》公然打出鼓吹“甘草”和“乡愿”的黑旗，这不是要人们紧跟“四人帮”帮云亦云，又是什么呢？

姚文元这个旨在禁锢思想、控制舆论的法西斯专政的“信号”一点燃，“四人帮”的帽子、棍子就都纷纷出动，集中围剿那些赞扬“勇敢”精神的人们。在姚文元之后，“四人帮”的打手戚本禹也对“勇敢”精神大加挾伐，说什么鼓励“勇敢”精神，就是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可是戚本禹到底有什么根据呢？看他挖空心思，才找到这样一个蹩脚的例子，他说，当有人在提倡海瑞的“勇敢”精神时，四川有一个“家伙”，因为水稻受灾说了一句“人背时，天也背时”的话，被一个富农钻了空子，说这个“家伙”“象个张飞，敢说”。由此，戚本禹便断言，提倡海瑞“勇敢”

精神，是和富农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一个富农说了一句“敢说”，就引起戚本禹这么大的惊慌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戚本禹之流不过是以批海瑞为名，达到打击那些有点“勇敢”精神的革命者罢了。

继姚、戚之后，“四人帮”的另一名打手，以及被江青称为“他（指姚文元）组织的写作班子”，先后化名罗思鼎、丁学雷、康立、方延梁等等纷纷出动，在全国范围内围剿海瑞的“勇敢”精神。《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等海瑞戏，全部被他们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加以批判。演过海瑞戏的，写过以海瑞为题材的剧本、剧评的，写过有关海瑞的文章，甚至在课堂上讲过海瑞的，悉数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列，加以挞伐。可见，姚文元之流，以批《海瑞罢官》为名，行法西斯思想独裁之实，其狼子野心是昭然若揭的。

我们党赞成过“乡愿”和“甘草”吗？不，这纯粹是诬蔑！“乡愿”和“甘草”都是和党的作风不相容的，因为这种人作事圆滑，见风驶舵，凡事调停，自居中间。他们走一步要看三步，四平八稳，什么党的事业，民族的利益，都以自身的得失为行动的准绳。这种庸俗腐朽的作风，是腐蚀剂，是我们党历来所坚决反对的。姚文元把“乡愿”和“甘草”同党的“最高利益”划了等号，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恶意歪曲。

我们的党反对过勇敢精神吗？不！我们的党一贯提倡和鼓励勇敢精神。毛泽东同志指出：“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也说，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要“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勇敢精神看成是巩固国家和发展文化的条件，可见勇敢精神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是靠这个勇敢精神，在白色恐怖下，发动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

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靠这个勇敢精神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是靠这个勇敢精神打垮了蒋家王朝的八百万军队，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也是靠了这个勇敢精神打垮了不可一世的“四人帮”；靠这个勇敢精神进行新的长征。可见，勇敢精神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精神之一。姚文元一伙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勇敢精神就是“敢于坚持错误”，“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这同样纯粹是诬蔑。

显然“四人帮”反对勇敢精神完全是为了实行法西斯的思想独裁，他们一面在舆论上对勇敢精神进行围剿，一面对敢于顶撞他们的同志实行残酷镇压。姚文元《评新编》一出笼，尽管气势汹汹，还是引起正直人们的极大愤慨，纷纷写信对他们的反动观点进行批驳。姚文元一伙气急败坏，立刻兴师动众对这些人实行残酷打击。试问，你们这样做不是地地道道的恶霸作风、法西斯专制独裁又是什么呢？

应该指出，后来“四人帮”之所以能利用梁效、罗思鼎来控制舆论，任意发布对各级干部的讨伐令，确实是由批判海瑞的“勇敢”精神而收到的直接效果。兴海瑞的文字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所走出的第一步。

开创影射史学的恶劣先例

“四人帮”是惯于“搞影射史学”的，他们捧女皇、批宰相，把史学当成他们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他们任意歪曲历史、伪造历史，把历史科学搞得乌烟瘴气。而这个“影射史学”的恶劣先例正是从姚文元《评新编》开创的。姚文元说写海瑞逼徐阶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而且是要把田退给地主。因此，他把“退田”当成政治“要害”来批。不难看出，姚文元怀着阴暗的心理来看历

史上发生过的一切事件，把几百年前地主阶级内部一场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引伸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来，把海瑞逼徐阶退田影射为“要人民公社退田”，从而开始了他们搞“影射史学”的卑鄙勾当。

海瑞逼徐阶退田，本来是历史事实。但是，姚文元为论证“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并且是要人民公社把田退给地主这样一个影射史学的命题，他便公然歪曲历史，说什么“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可‘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中。”退田只能退到“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这个论调是不值一驳的，农村中不但贫农还有一部分土地，而人数比中小地主多得多的中农则是“有田”的。贪得无厌的大地主徐阶，他能不侵占农民的土地吗？姚文元所谓徐阶一类的大地主只兼并中小地主的土地，是毫无根据的。本来他想以此来说明“退田”是要害，却暴露了他伪造历史的拙劣伎俩。海瑞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说：“盖华亭乡宦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讟怨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又说：“臣于十二月内巡历松江，告乡宦夺产者几万人。”在《复李石麓阁老》的信中也说，徐阶退田“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难道这几万告乡官夺产的“小民”都是中小地主吗？难道被海瑞诬为“刁险”的“民”，不是指农民而是指地主吗？

姚文元声称：“《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尽管姚文元摆出一副明史权威的架势，也无济于事。历史的真象无情地打了他的嘴巴。《明史·海瑞传》明明写着，海瑞为了打击豪强，反对兼并，凡“贫民田入富室者，率夺还之。”而黄秉石在《海忠介公传》中也明明写道，海瑞“令民各自实田，凡侵夺及受献者还原主。”海瑞在驳戴凤翔所谓“民为虎，乡宦为肉”的谬论时指出：“今日乡宦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况先夺其十百，今仅偿其一乎。”“史”和“传”都说明退田除了“受献”的部分还有“侵夺”的部分，而且明确指出是“贫民田入富室者。”难道中小地主也称“贫民”吗？可见，姚文元所谓大地主

只侵占中小地主的土地，退田只退“受献”部分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兼并和反兼并的斗争，在封建社会里是一种历史现象，几乎每个朝代都出现过，这种历史现象向来就是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课题之一。明中叶江南地区土地兼并是十分严重的。据《明嘉靖实录》记载，宰相严嵩占地“遍于江西数郡”，伍志萃的《林居漫录》记载，苏松地区的大地主徐阶占地竟达“二十四万亩”，由于“子弟家奴横暴乡里”，弄得民不聊生，“如坐水火”。海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逼徐阶退田的。至于海瑞逼徐阶退田的目的和动机，海瑞并没有掩盖他地主阶级的阶级本质，一方面他说“退田”是为了“止”民风；另一方面，他也说压制豪强是为了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海瑞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维护明王朝的利益，他忠于地主阶级也忠于皇帝，这是必然的，也没有人否认。姚文元指责海瑞“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简直是今古奇谈。在中国，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怎么能要求明朝的海瑞来解决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呢？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评价海瑞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他的所作所为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我们认为海瑞反对兼并，打击乡官大地主，以及修水利，平冤狱等实践活动，尽管收效不大，而且是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应该给予适当的肯定。

海瑞逼徐阶“退田”，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它和现实生活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姚文元却偏偏要把它和人民公社拉在一块，来为他的影射史学服务。自从姚文元开创了 this 个影射史学的恶劣先例，江青妄想当女皇，就大捧吕后，武则天；为了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他们就捏造了孔子是“端着胳膊”走路；为了攻击华国锋同志，他们就胡说什么孔子五十六岁当公安部长等等，这些罪恶的影射和攻击，就是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

为“四人帮”制造冤狱大造舆论

姚文元在《评新编》中对海瑞“平冤狱”特别反感。他断言海瑞“平冤狱”是假的，是为了“麻痹农民的觉悟”，是“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一句话“清官”比贪官还坏，平冤狱的人比造冤狱的人还坏。姚文元按照他搞影射史学的伎俩，在否定“清官”平冤狱之后笔锋一转，又转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来了。他说“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完全出于恶意。本来海瑞‘平冤狱’和现在有没有冤狱完全是两回事。姚文元却硬是把海瑞“平冤狱”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联系起来。这样做的险恶用心是妄图把写“清官”“平冤狱”的人都打成是要替地主富农平冤狱，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另一方面力图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狱，借以售其奸。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没有冤狱，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只要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存在，也就可能出现冤狱。同时由于我们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办案缺乏调查研究，也会出现冤狱。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不是再明白不过地说明我们今天也可能出现错案、冤案吗？否则还有什么必要“纠”呢？不过，今天出现冤狱，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或早或迟总会得到平反和昭雪，这是和历史上冤狱有本质区别的。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极端黑暗的社会中，冤狱遍天下，广大农民生活在死亡线上，他们投告无门，多少农民为因受到地主的逼迫含冤死去。正是因为这

样，有些“清官”，如包拯、况钟、海瑞等，平了一些冤狱，那怕只是极其个别的案例，也为民间加以传颂。姚文元却极力否认“清官”曾经平过“冤狱”，他说，“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因此，他断言“平冤狱”是假的。这是什么逻辑？撤官和“平冤狱”是一回事吗？没有撤官并不等于没有平冤狱。事实上，我们现在还可以查到海瑞“平冤狱”的有关案例，如在《淳安政事》中的《吴吉祥人命参语》、《徐继人命参语》，以及在兴国的《陈舜兴人命参语》等等。海瑞处理这些案件时，都没有撤过官。因为没有撤过官，就断言没有平过冤狱这纯粹是姚文元的混帐逻辑。

当然，海瑞虽然平了一些冤狱，但他和历史上其他“清官”一样，是不可能做到有冤必平的。海瑞自己也说：“每放告日，状动以三四千计，臣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被论自陈不职疏》）即使是这样，海瑞还是受到群众的欢迎的，一日放告，收状即达三四千件，一次“巡历”松江，告状者即达几万人，这说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封建社会的农民还是认为“清官”是比“贪官”好的。在历史上，贪官从来就是荼毒人民，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没有半点可以肯定的。“贪官”比“清官”好的谬论是“四人帮”别有用心制造出来的。因为，“四人帮”就是当代最大的“贪官”集团，他们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到处敲剥，穷奢极欲，比起历史上任何贪官集团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姚文元反对“平冤狱”，是有其政治阴谋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制造冤狱的罪恶勾当。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对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实行残酷镇压。霎时间，神州大地乌云滚滚，冤狱遍于国中，一次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活动，就把全国千百万优秀儿女打成了“反革命”；一场“评法批儒”的闹剧，又把全国千百万干部打成“复辟派”，凡此等等，举之不尽。还是以姚文元《评新编》一文为例吧！这是“四人帮”发迹时制造的最早的一桩大冤案，

姚文元打着批判《海瑞罢官》的招牌，把和海瑞有一点“关系”的人统统打下去，仅是这么一个文字狱，就在全中国制造了成千成万的冤案。著名的艺术家周信芳同志不就是因为演过海瑞戏，被你们迫害致死的吗？试问，这难道也不算冤狱吗？姚文元自己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制造了冤案的罪魁之一。但是，这个伪君子、两面派，却一面在大兴文字狱，大肆制造冤案；一面叫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这能骗得了人吗？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以批海瑞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姚文元《评新编》的出笼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大阴谋，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浩劫。从此，无数的知识分子被“四人帮”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几千年来祖国文化被一笔勾销，人们的思想被禁锢，舆论被箝制，偌大的中国，只有“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没有人民的一点民主。中国的舆论权威只有梁效、罗思鼎；中国的文学艺术园地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被歪曲成“儒法斗争史”；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污蔑为“走资派”；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攻击为“臭老九”……等等，等等，“四人帮”的一切罪恶都是从这个反革命“信号”开始的。《评新编》的影响极坏，流毒至广，必须进行深入的彻底地批判。

（《光明日报》1978年11月15日）